

亚洲腹地

【瑞典】斯文·赫定 著

徐十周 王安洪 王安江译

探险八年 1927—1935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

1927—1935

【瑞典】斯文·赫定 著

徐十周 王安洪 王安江译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BY
SVEN HEDIN
STOCKHOLM 1944**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
1927~1935
[瑞典]斯文·赫定著
徐十周 王安洪 王安江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八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5.625印张 4插页 600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000

ISBN7 228 02293 9/K·219 定价:13.20元

徐炳昶(左一)、斯文·赫定、袁复礼在研究工作



驼队穿越荒漠



做气象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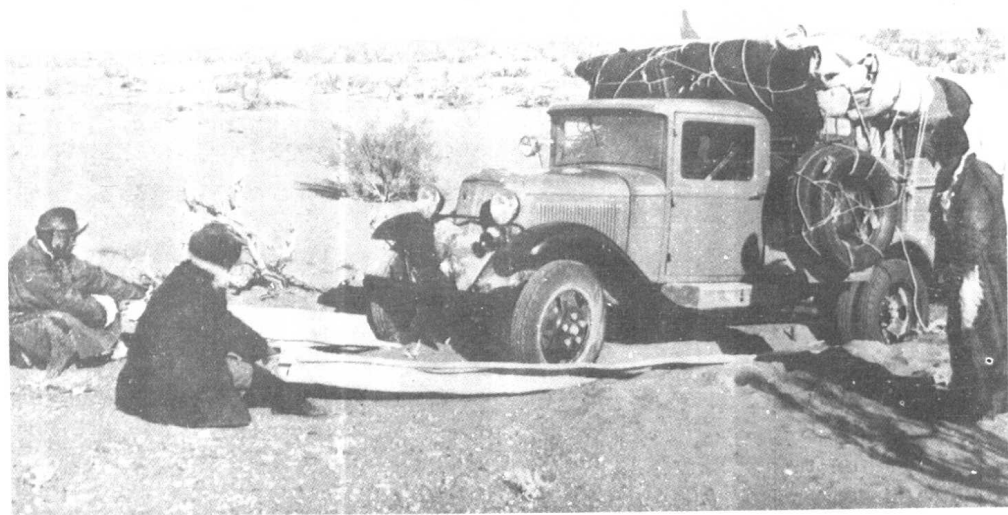
考察团的营地



制作独木舟



乌鲁木齐洋行街



泥泞路上



在孔雀河



在罗布泊

斯文赫定及其《亚洲腹地探险八年》

(代序)

杨 铎

19 世纪的最后 10 年,新疆南部的首府喀什噶尔聚集着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外交官、探险家、职业情报贩子、商人、旅行家和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这个边远省份感到兴趣的人物。1894 年炎热的初夏,在喀什噶尔的外国人当中最激动人心的话题就是:杜特雷依探险队在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到底出了什么事。

杜特雷依·德·莱因斯是法国地理学家,于 1890 年前往新疆与西藏。但当他们于 1893 年 9 月 3 日离开卡墙(即今且末),进入阿尔金山之后,就失去了踪迹。关于他们下落的各种传闻在喀什噶尔不胫而走。当人们突然意识到:这不再是茶余饭后的谈助或渲染中国西部神秘、危险的佐料,而是攸关性命时,关于组织人力前往西部纵深处寻找(或说救援)杜特雷依的种种设想开始付诸实施。这时,正巧有一个因考察了波斯及俄领中亚而小有名气的年轻人路经喀什噶尔。开始,他只是认真听取关于杜特雷依探险队的各种传闻,但很快就作出决定:要在新疆停留下来,参与寻找那在青藏高原处女山中销声匿迹的探险队。——他就是年仅 29 岁的瑞典人斯文·赫定。

正是由于这个久已被人遗忘的插曲，才使斯文·赫定这个名字与中国西部：内蒙古、西藏、甘肃，特别是新疆，再也不曾分离。

—

1865年，斯文·赫定诞生于瑞典首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庭和早年经历并没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与众不同的，是他对所处时代的独特感受。那正是为19世纪地理大发现的热浪吞没的时代。西方地理学界，也许可以说是整个知识界已向地图中的空白点宣战，征服极地的船队一支支驶出港湾，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因为测绘了一条热带雨林中的河流或标明某个处女峰的海拔高程，可以一夜间扬名天下。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探险小说早已打破国界，英国探险家利文斯顿、美国记者斯坦利笔下的非洲，像他们的探险活动一样广为人知。呼吸领略了这样的氛围，使斯文·赫定对未知世界有一种执著的迷恋。所以，当19岁时（中学刚毕业）获悉有机会到遥远的巴库作家庭教师，他就毫不犹豫地踏上了离乡之路。工作结束后，他以所有的薪金为路费，到波斯及中东进行了首次考察旅行。

1886年秋天，斯文·赫定进入大学学习。学习期间，曾师从于一些当时著名的学者，但对他影响最大的，首推柏林大学的地理学教授李希霍芬。

李希霍芬本人就是亚洲的探险家、旅行家，几乎走遍中国各行省，并到过台湾（1895年），著有3卷巨著《中国》。李希霍芬对新疆有着特殊的兴趣，附带提一下：今天家喻户晓的名词“丝绸之路”就是他首创的。

1890年4月，斯文·赫定再次踏上远赴中东的征途。作为瑞

典王国外交使团的翻译，他圆满完成了任务，并在国王支持下，开始了他在亚洲的第2次探险旅行。这次他将横穿亚洲腹地。离开德黑兰就一直向东，进入俄国后，又继续向俄领中亚前进。1890年12月，他由俄国的鄂斯（又译为奥希）进入中国新疆省，经亮噶尔往前喀什噶尔。2月14日，抵达中亚名城喀什。喀什曾被浩罕汗国的冒险家阿古柏占据达十余年，1877年才为清军收复。喀什只是斯文·赫定中亚之行的极东折返站，尽管如此，短暂的喀什之行给他的一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除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和英国领事马继业（即格奥尔基·马嘎特尼），他还结识了英国军官、探险家荣赫鹏（即杨哈斯本）。时过30年，斯文·赫定在其《我的探险生涯》（又译为《亚洲腹地旅行记》）一书中，还真切地回忆起与荣赫鹏在喀什泰尼巴克花园中的初次会见；而荣赫鹏则指出：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具有科学探险家的全部素质。尽管荣赫鹏后来成为英国入侵西藏的谋主，但这一评价应该说是颇具穿透力的。

1891年1月初，斯文·赫定离开中国边境，返回瑞典。他在伊塞克湖东岸的小城祭扫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坟墓。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中亚探险的先行者之一，两年（1888年）再次赴中国首途时死于此处。以后的实践证明：无论在对罗布泊历史位置的考证及对西藏的探索，斯文·赫定都比这位长眠于湖畔的听涛人走得更远。

1893年10月16日，斯文·赫定又一次离开故乡，前往亚洲。1894年2月进入帕米尔地区，并在慕士塔格山脚下住了一段时间，曾试登这个名副其实的“冰山之父”。同年5月1日，再抵喀什。当他决定留在中国西部，而不像上次那样匆匆离去时，杜特雷依事件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失踪一年的杜特雷依的助手格伦纳死里逃生，向公众揭示了杜特雷依及其探险队的命运。

进入阿尔金山之后，杜特雷依一路向西南方前进，在无人地带艰苦备尝，终于到达青海藏区，却遭到了灭顶之灾。一开始是达赖

喇嘛传下谕旨，下令阻止杜特雷依前进——他无意会见这些不速之客。他们无计可施，被困阻在长江江源地区。一天，在雨中，他们向一户藏民要求投宿，未被接纳，便命随行的哥萨克卫兵砸开院门，硬冲进民宅。次日清晨，杜特雷依发现两匹马被盗，于是便强夺了藏民两匹马充数。此行才走出不远，就被 200 余名愤怒的藏民追上。格伦纳曾力图用担架把腹部受伤的杜特雷依抬走，但藏民抓住了他，拖了 7 里，投入长江的激流。

为了怕遭到报复，格伦纳逃到拉卜楞寺藏匿，到次年夏季，才回到巴黎。法国政府及学术界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结论是公正的：这一悲剧是由于探险队无视当地居民，才酿成惨祸，应自负全部责任。

至此，杜特雷依已不再需要寻找和救援。但斯文·赫定并没有改变他要留在新疆的决定，并于 1895 年 2 月 17 日他 30 岁生日那天离开喀什，走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其遭际很快就表明，这次需要救援的正是他自己。关于杜特雷依及其探险队的命运及功过，那只能是另一篇学术论文的题目，然而从此后 40 年间斯文·赫定在新疆、西藏的探险活动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从杜特雷依的遭遇中吸取了受用终生的经验和教训。他在漫长艰险的旅途中，必不可少的一条就是依靠当地群众，可以说，他一生中许多重要考察与发现都与其这一特点密切相关。

斯文·赫定这次由叶尔羌河横穿沙漠抵达和阗河（即今和田河）的探险被称为“死亡之旅”。他大概是中外探险家中唯一做这种在沙海中由东及西的踏察的。由于经验不足、条件恶劣，他几乎陈尸沙海，经过苦苦支支撑才得救于正巧路经和阗河畔的一支骆驼队。《亚洲腹地旅行记》中有关此行的章节，是全书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段落之一。

1899 年，斯文·赫定又在瑞典国王及诺贝尔的资助下，在新疆进行了第二次考察探险。1900 年，由于一个偶然机遇，他发现了

楼兰古城，使那幻影一样湮灭十几个世纪的古国复显于世。在此之前，他虽然也发现过丹丹乌里克（象牙房子，即塔克拉玛干古城）、喀拉墩等古遗址，但楼兰古城的发现，最终确立了他作为一个探险家的世界性声望，为近百年来的丝绸之路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是以寻找斯文·赫定的足迹来展开自己的探险活动的，他步斯文·赫定后尘，发掘了丹丹乌里克、喀拉墩，他是手执赫定绘制的地图走进楼兰古城的。一般来说，斯文·赫定只是“发现者”，这是其考察探险的又一个特征。

1907年斯文·赫定第四次来华，他的主要目标是西藏。他比普尔热瓦尔斯基、杜特雷依都幸运。不知什么原因，拉萨简直使普尔热瓦尔斯基着了魔，他倾毕生精力，希望能进入西藏，但他从未能踏上拉萨的大地，瞻仰布达拉宫的姿容。斯文·赫定则不但在西藏作了考察，有重要的地理发现，还成了班禅额尔德尼的座上客，为札什伦布寺所接纳。

此后，斯文·赫定转向中东和其他地方进行探险旅行，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他一生事业的低谷。

二

斯文·赫定再次踏上中国的大地，已是1926年的冬天。他再次来华的初衷，是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为开辟欧亚航线（上海——柏林）作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这次他不是单枪匹马前往中国，而是带来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但考察还在筹备中，就受到北京学术界的一致反对。应该客观地说，斯文·赫定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五四”运动后形成的中国知识界所具有的现代意识、民族精神与科学、民主思想，忽略了

辛亥革命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

经过近6个月的谈判,斯文·赫定终于与北京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就即将进行的考察达成了协议。协议的最重要部分是:本次考察由中瑞双方共同组成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并吸收了5名中国学者、4名中国学生(后来又增加了几名中国学者);由斯文·赫定及当时北京大学教务长、知名学者徐炳昶(旭生)分任中瑞双方的团长;考察团所采集、发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样品等等,都是中国的财产。

成立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及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可以看成中国学术界成熟并形成社会力量之一的标志。而对于斯文·赫定来说,一开始是一个让步或说是妥协,但其重要性是在此后长达8年的实际科学活动中才逐步显示出来的。正是基于协议的上述几条原则,才确保了这一规模空前的考察竟能在战乱频仍、哀鸿遍野、政权一再更迭的动荡背景下取得成功。这个协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而签约的一方正是斯文·赫定,不是其他什么人,也绝不是纯属偶然。斯文·赫定不是完人,对他的评价也并不一致,但所有真正了解他一生的事业的人,对其下述特点是没有分歧的:他是向往中国古老文明的,是热爱中国的,“中国情结”在他一生中从未消退。正如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终生不结婚时,他所回答的:“我已经和中国结了婚!”他在中国的活动,总体来说从事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探险,并不负有其他使命,而科学探险是他那个时代一项有益于人类认识未知世界的、受到公众拥戴的行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一开始由汉莎航空公司提供大部分资助,但以后的考察实践证明,斯文·赫定成功地把它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多学科的科学考察。可以说,斯文·赫定是中亚最后一位杰出的“古典”探险家,也是第一位使其探险活动与时代的、社会的进步步调一致的现代中亚科学考察的组织者。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伊始及协议签约之时,斯文·赫

定就受到了外国中亚探险家的反对或劝告。他们或是指出：如果签定这样的协议，今后其他人就不能再无视中国的利益，换句话说，将使个人的以“找宝”为唯一目的的探险退出中亚舞台；或是预言：中国学者根本不配参与考察活动。对此，斯文·赫定在其《长征记》（直译为《在征途上》）、《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等著作中都作了有力的批驳。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使纯粹为美国博物馆搜集藏品的安德鲁斯探险队无法成行，使步勒柯克后尘的德国中亚探险队（由德林克尔率领）双手空空地离去。而且，此后于1930年组建美国中亚考察团（安得鲁斯率领），1931年组建中法科学考察团（即雪铁龙汽车旅行团，由哈特和卜安率领）都不得不仿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之例，与中国签订了类似的协议。

当然，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功不仅在于签订这样一个协议，还在于怎样看待协议和能否信守协议。斯文·赫定不但在其许多著作中记述了他对与中国学术界合作的过程，还在其《亚洲腹地旅行记》的序言中特意指出：

我准备在另一篇专文中告诉世界各国读者，我们中外学者在西北科学考察中的活动。但我不能不在这里特意指出：我们与中国朋友的合作是最完美的。我们在一起情同手足地工作，没有丝毫嫉妒、齟齬或误会。我们没有介意国籍或民族，唯一目的是为国际的科学服务。

在这一方面，从前有些西方旅行家恶劣地违犯中国国民的感情，但这类事在我们中间绝无所闻。中国人在他们的国家内是在自己的家里，外国人只是客人，……由于他们（指某些西方旅行家）不应取的态度，其自身必食其果。就我个人所经历而言，我将永远不忘记这6年（序文写于1933年）的愉快时光，我能有这种殊荣去与新中国的一些最杰出的学者在野外及北平共事。我抱着友情与感谢，将终身记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在《长征记》的序言中,斯文·赫定不但充分肯定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将其称为中外学术合作的成功范例,他还特别提到考察团中的3位中国发掘工庄永成、白万玉(附带提一下,30年后,白万玉曾出任明定陵发掘队的副队长,已是古器物修复专家)、靳士贵,他明知道他对他们的感谢“大概是达不到他们的跟前”,但他仍然特意向世界各国读者指出这一点。

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功相比,中法科学考察团则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在其回忆录中对中法考察团作过具体的描述。杨钟健是该考察团中的8位中国学者之一,他称此行为“本质上互相都不信任”的“颇伤脑筋的旅行”。法国学者德日进虽也参加考察团,但“不算中人之一分子”,而法国团员除德日进,都不是真正的学者,“此辈法人,多在殖民地工作过,完全以殖民地主人的态度待人,当然引起中方人员反感,后来终有一次大分裂”。(《杨钟健回忆录》第71页)这次耗资颇巨的“科学考察”实质上是商业宣传的特殊形式,因而中国学者“有如入宝山却空手而归之感”。如果把斯文·赫定还给他所处的时代,就不能不承认,他是他那一代人当中正直的、能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有识之士。

结束了马拉松式的谈判,中瑞双方从对手变成了同舟共济的同事。1927年5月9日,斯文·赫定与徐炳昶率领一支空前规模的现代化科学考察团离开北京,前往中国西北。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野外工作一直坚持到1935年。1933年10月21日,斯文·赫定及几个瑞典、中国学者再次从北京启程,前往内蒙、新疆等地。此行是受当时南京中央政府铁道部委托,去勘测、考察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的可行性。一般也把这次于1935年3~4月间结束的汽车旅行考察归于西北科学考察团活动的序列。这次旅行肇源于北京的一次宴会。在宴会上,斯文·赫定结识了当时的外交部次长刘崇杰,并向刘崇杰陈述了对中国时局的忡忡忧心。那是1933年的夏天,当时外蒙古已独立英

国始终觊觎西藏,满洲(东三省)、热河为日本侵据,连内蒙古也成为日本势在必得的地区,一方面策动德王等蒙古王公搞“高度自治”,另一方面毫不掩饰地扩大其在内蒙的实力与影响。而占中国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自杨增新死后爆发了民族仇杀及内战,新疆处在特殊的危机中,中央政府面临着失去这一巨大疆域的危险。为此,斯文·赫定提出了优先考虑新疆问题,以稳住雪崩一样的局面的方略,其具体措施,首先是修筑并维护好内地联结新疆的公路干线,进一步铺设贯通亚洲腹地的铁路。把着眼点放在加强内地与新疆的联系上,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具有远见卓识、忧国忧民的中国政治家、学者一再予以强调的共识。正是出于这个宏观的、符合中国根本利益的意愿,斯文·赫定和他的助手们像赴火的飞蛾,坚韧不拔地向处在战火荼毒中的新疆进发了,写下了扣人心弦的篇章。而这8年当中的经历、甘苦、成败得失,都忠实地记录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当中。

1987年12月2日,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主持下,中国的科学家们聚会于北京科学会堂,隆重纪念了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60周年。大会对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次考察被称为“流动大学”,是现代中国地质、地理、考古等众多学科在现代化进程中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

1935年,结束了在中国的野外工作回到瑞典,斯文·赫定全力支持《中瑞科学考察报告》的结集、审订、出版事宜。该丛书多达55卷,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一宗重要的遗产。由于抗日战争及以后的国内战争,使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时断时续,但他仍尽力为中国的文化遗产——如居延汉简、袁复礼教授的珍贵地质样品——不致为日本攫夺而奔走。去世前不久,他还致函中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请他打听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国团员陈宗器(帕克陈)的安危。希望与战乱平定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